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

(江戸明治編)

總目提要

有之東然天有不測之風人有不測之禍不可不預

限方 先我主人之是輔也予之歸也感嘆多矣其日之風也予

比由予之果也天分予之風也予之歸也感嘆多矣其日之風也予

暴風大猛我家的屋校都吹散了我也聽人說道

海面上打翻了十來隻商船真正可憐見走船的人

原來重利輕命之徒而未必免此般災禍難則是個

李無未 等著

中華書局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東亞珍藏明清漢語文獻發掘與研究》
(12&ZD178)階段性成果之一

廈門大學國學院 2010 年度重點支持項目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戸明治編) 總目提要

李無未 等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戸明治編)總目提要/李無未等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5.6

ISBN 978-7-101-10821-7

I.日… II.李… III.漢語-教材-圖書目錄-日本-近代
IV.Z88;H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48879 號

-
- | | |
|------|---|
| 書名 |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戸明治編)總目提要 |
| 著者 | 李無未等 |
| 責任編輯 | 張可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
| 版次 |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0 $\frac{7}{8}$ 插頁 2 字數 220 千字 |
| 印數 | 1-10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7-101-10821-7 |
| 定價 | 58.00 元 |
-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戸明治編)》
編委會名單

主 編:李無未

副主編:陳珊珊 秦曰龍 鄒德文

編 者(排名不分先後):

李無未	秦曰龍	陳珊珊	鄒德文
于冬梅	汪銀峰	趙小丹	楊杏紅
陳明娥	孟廣潔	李光傑	孫偉傑
楊穎虹	孔 永	王淑芳	魏 薇
吳 菲	徐 聰	許彬彬	邱宏香
馮 煒	董冰華	駱 冰	陳 莎
李 遜	吳淑純	趙 苗	劉 名
趙 方	王宇宏	張 娜	張 輝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戶明治編)》

纂說

《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戶明治編)》匯集了從享保元年(1716)到明治四十五年(1912)之間,即日本江戶、明治兩個時代,日本漢語教育體系之下所採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漢語教科書,總計一三四種。這其中,日本學者編纂的漢語教科書占據了主體部分;同時,還適當收入了一些歐美學者撰寫、日本漢語教師翻印或編譯並具體應用於對日本人漢語教學活動的漢語教科書,以及一些由中國學者編纂、參與編纂或審定並在對日本人漢語教學中長期使用的漢語教科書。歐美學者和中國學者所編寫的漢語教科書在日本漢語教育史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是日本漢語教科書體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一直以來,世界各國漢語教學學者對這部分漢語教科書特別重視,致力於發掘其中所蘊含的巨大漢語教學理論價值;收入這些漢語教科書,對科學地研究日本漢語教育史意義十分重大。我們認為,這一定會大大加快科學的日本漢語教科書體系形成歷史的學術研究的進程。

對這一三四種漢語教科書,我們根據歷史關係、教學重點、文體、應用、語言類別等性質分為八卷及一個附錄。

第一卷:江戶唐話課本。收錄江戶時代為滿足當時漢語教學需要而編撰、以普通漢語學習者為對象而公開發行的漢語教科書,以及唐通事教育子弟學習漢語所用的家傳性質的教科書;為體現傳承脈絡,明治前期完全繼承了江戶漢語教科書形式的兩部文獻

也收入本卷。早期唐通事使用的家傳教科書是日本漢語教科書的重要源頭之一,而公開發行供普通漢語學習者使用的漢語教科書意味着日本漢語教科書真正意義上的發端。

第二卷:明治一般課本。收錄明治時代廣泛應用於普通漢語教學活動的綜合性漢語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中包含語音、文字、詞匯、句型、會話、篇章等多種材料,體現了漢語教學內容的多樣性。

第三卷:明治語法語音文字課本。收錄明治時代以漢語官話語法、語音、文字等語言要素為教學內容的漢語教科書,展現了日本漢語教育界對漢語本身的研究成果。

第四卷:明治會話課本。收錄明治時代以漢語官話口語會話為主要教學內容的漢語教科書,體現了“會話中心主義”教學理念。

第五卷:明治時文課本。收錄明治時代以漢語官話書面語及公務、商業用文寫作為主要教學內容的漢語教科書,體現了日本漢語應用文教學的成果。

第六卷:明治方言課本。收錄明治時代以中國廣東、南京、臺灣、東北等各地方言為主要內容的漢語教科書,體現了日本漢語教學界對漢語多地方言的全面認識。

第七卷:明治文化閱讀課本。收錄明治時代以中國風俗、政經時事、寓言故事等為內容的漢語讀本。

第八卷:明治字辭典課本。收錄供日本人學習漢語或輔助教學的實用工具書。

附錄:收錄英國外交官威妥瑪編寫的《尋津錄》和《文件自邇集》兩部漢語教科書。這兩部文獻非日語翻譯、注釋或改編本,納入“日本漢語教科書”體系下似欠妥,但其對日本漢語教科書的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故作為附錄收入。

各卷內的排列次序儘量以發表年代先後為準,從而使讀者能够比較清楚地把握該卷教科書的發展脈絡。每種書的提要以介紹

基本情况為主,包括版本、著錄、內容、體例以及學術價值等,力求讓讀者對文獻有一個概括的瞭解,以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提升其學術意義。

日本學者有關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的理論性成果已經不少,顯現了獨特的“國別”研究優勢。主要成果有:一、倉石武四郎《中國語五十年》,岩波書店,1973年;二、六角恒廣《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王順洪譯,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三、六角恒廣《日本中國語教學書志》,王順洪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四、六角恒廣《日本近代漢語名師傳》,王順洪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五、六角恒廣《中國語教育史稿拾遺》,不二出版,2002年;六、六角恒廣《中國語關係書書目》(1867—2000),不二出版,2001年;七、安藤彦太郎《中國語與近代日本》,岩波書店,1988年;八、埋橋德良《日中言語文化交流的先驅》,白帝社,1999年。不言而喻,這些成果是我們從系統上認識日本漢語教育史問題的起點。

但我們認為,目前挖掘日本漢語教育史第一手資料文獻的工作更為重要和緊迫,因為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原始文獻的匱乏必然會制約着我們的研究水準,而這恰恰是理論性成果所不可替代的。由此,日本漢語教育史文獻,尤其是居於日本漢語教育史核心地位的漢語教科書文獻正是我們中國學者所急需的資料。

匯集日本漢語教科書的工作,日本學者已經有所開展,而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六角恒廣主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不二出版,四十冊,1991—1998年)、波多野太郎《中國語文資料匯刊》(三、四、五篇,不二出版,1993、1994、1995年)等。

誠然,六角恒廣、波多野太郎等先生匯集的重點與我們的考慮具有相當的一致性,比如作為“國別”日本漢語教學歷史文獻,尤其是漢語教科書文獻,當然也包括歐美學者和中國學者所編寫的漢語教科書文獻的學術價值,以及日本漢語教育史在世界漢語教育

史研究中的獨特意義等。但我們認為,還有一些文獻對於研究漢語史、漢語方言史、漢語學史以及世界漢語教學史具有重要意義,如《粵東俗字便蒙解》(1870)、《岡氏之支那文典》(1887)、《支那文字史》(1900)、《上海語獨案内》(1904)、《漢字原理》(1904)、《袖珍實用滿韓土語案内》(1904)、《現代支那語學》(1908)、《漢字要覽》(1908)、《口袋必攜實用上海會話》(1910)、《日用和教育上漢字活用》(1910)等。由此,在文獻的選擇上,我們與六角恒廣、波多野太郎等先生存在着明顯的區別,即選擇範圍有所擴大,考慮得更為周全和細密。

比如《現代支那語學》,後藤朝太郎著,博文館1908年發行,被列入當時所謂“帝國百科全書”之中。如果僅僅從一般漢語教科書角度去看,它的實用性價值肯定要大打折扣,因為它的理論性很強,不適宜作一般學漢語的教科書。但從世界範圍內漢語學史,從專業性教科書的角度看,這部書就實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這是日本學者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語言學理論比較科學、系統地分析現代漢語,並把它作為一門學科來對待,從而開啓了研究現代漢語的新時代;

二、該書建立了一整套研究現代漢語的學術模式,對漢語的性質、文字和言語、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文言和口語、現代漢語的標準語、北京官話、漢語方言、漢語和同族語的比較、現代漢語發展趨勢等問題都有所討論,邏輯結構和綫索非常清楚;

三、該書就現代漢語的一些基本學術問題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結論,如研究現代漢語應該以口語為主,現代漢語標準語為北京官話,這就從理論上確定了研究現代漢語並以活的口語為關注對象的基調;

四、該書在進行口語和文言、現代漢語和同族語比較的過程

中,使讀者真切地認識到了北京官話口語的特點,對認識漢語性質具有重要的啓示價值。

如此重要的學術著作,若不能使之進入當代中國學者們的視野,而任其深深埋藏在圖書館的舊書堆裏而被忽略,還是讓人感到十分遺憾的。

《漢字原理》也是一樣的。《漢字原理》,高田忠周著,東京吉川半七 1904 年發行。在該書總論中,作者談到,當時有一種傾向,即把漢字看作是“厄介物”,意思是“麻煩的東西”。甚至還有人認為漢字很快就會被“消滅”,原因是其數量多且難以記憶。高田忠周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漢字雖然數量多,但如果用“六書”結構去分析,還是有規律可循的,這樣就能變多為少,容易掌握,“厄介物”之論自然也就不成立了。他指出,漢字有一一五個“文母”,可以用二文、三文、四文、五文配合成五七〇個字母(類似《康熙字典》的部首);由這五七〇個字母組合,就能繁殖成千上萬個漢字。

作者對什麼是“六書”進行了詳細的解釋,依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次序而論。但作者也強調,書體幾經變遷,有一些字依照“六書”已經很難辨析,所以須要說明源流、解釋清楚。

在凡例中,高田忠周說明了編寫原則:一是選用的一一九五個“首字”為教科書常見,並可用於新造字;二是說解中的古文字存在於三代之器以及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說文解字》中的篆書(即小篆)和古文字同體;三是解釋以《說文解字》為主,間或采用其他的漢代人之說,參酌清代考證家和小學家之說,為避免冗長,僅指出引書出處;四是解釋一定附以“六義”之理論加以辨明;五是解說務以平易,摻雜了專科之學和經學的意味。

《漢字原理》後還附有《漢字字源系譜》。在《系譜》的緒言中,高田忠周指出,字有父母子孫的統系,父母孳乳而產出無數子孫字族,形成宗系。《系譜》依據《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加以補足,而成

爲五八六個部首字。《說文解字》部首字的編次依據“形似”而類聚,理論根據是《說文序》的“易義”。《系譜》仿此而將部首字分爲六大類:系於天地陰陽紀數及其易卦,七十五字;系於人體及人事,二二二字;系於居家構造服飾器用飲食,一一五字;系於托事而爲形爲義,五十六字;系於草木,五十字;系於禽獸魚蟲等動物,六十八字。其中與“人事”有關係的占一半,均“取之於身”。這些部首字還可以“六義”分類,指事四十三字、象形二五三字、形聲七十四字、會意一七三字、轉注二十二字、假借二十一字。上述部首字即所謂“父母文”,在正形下附以“他文”,從而構建了非常細密的漢字字源系譜,對理解和掌握漢字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理論體系。

高田忠周《漢字原理》及其所附的《漢字字原系譜》就是在今天來看,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因爲中國也曾經有過關於是否廢棄漢字的激烈爭辯,儘管今天看來十分荒唐,但畢竟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漢字字源系譜”這個今天許多學者關注的課題,一百多年前日本學者已經有所思考並形成比較系統的理論思維模式,可惜的是今天許多學者並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們認爲,高田忠周的學術觀念與今天學者們的“漢字字源系譜”學術思想應該是共通的。

我們也看到,六角恒廣和波多野太郎兩位先生的工作還存在着一些缺憾,有許多在日本漢語研究史上比較重要的文獻沒有收入,如《粵東俗字便蒙解》(1870)、《岡氏之支那文典》(1887)等,讓人感到美中不足。如此狀況無疑與今天飛速發展的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形勢難以合拍,所以,繼續匯集日本近現代漢語教科書的工作還有相當大的拓展空間,許多珍貴文獻的挖掘工作要不間斷地做。繼續編印日本漢語教科書文獻,不僅可以彌補六角恒廣、波多野太郎等先生文獻收集上的缺憾,更可以通過日本漢語教科書文獻的收集而開闢新的學術領域,進一步明確學術意識,轉換學術視

角,以便適應當代中國“海外漢學”學術發展趨勢的基本要求。

縱觀國內外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文獻研究,雖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研究的冷清狀況,對一些基本問題的探討還停留在淺層次的、粗放的狀態。上述狀況的改變,需要學術界強化認識、共同努力,真正提高研究水準。根據我們的觀察,目前的研究還存在着十個方面的基本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花大氣力探討:

一、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書編纂者的語言意識,如語音意識、語法意識、詞匯意識的闡發不夠。

所謂語言意識,指的是人們對語言的識別能力及其清晰程度以及固定的語言觀念、認識。日本學者編寫的漢語教科書體現了其對當時漢語語音、語法、詞匯以及語言教育的認識,已經形成了比較成型的語言觀念。對於今天的學者來說,這種語言意識既是漢語史研究的需要,也是漢語學史探討的需要,潛在的學術價值是毋庸置疑的。遺憾的是,人們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這方面的價值發掘不夠,由此帶來了研究上的缺憾,最為突出的表現是,還很少有國內外學者發表相關研究論著。趙小丹的學位論文《〈日清會話辭典〉語音研究》可以說是在這方面的有益嘗試。通過她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學者在運用日語假名及其標記方法、羅馬字及其標記方法、其他符號及其標記方法時所顯示的語音描寫意識,以及比較明確的連讀變調意識、“輕聲”及“兒化詞”意識,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

二、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之間的繼承與創新關係研究停留在表面上,僅以體例研究代替內在關係研究。

從《亞細亞言語集》(1879、1880)、《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1880)到《官話指南》(1881),再到《北京官話中外蒙求》(1911),其編纂體例之間存在着比較明顯的繼承與創新關係,六角恒廣《日

本中國語教學書志》一書中，這方面的內容不少。但我們認為，僅以體例研究代替內在關係研究是不夠的，因為作為外在形式的體例之間的異同很多時候並不能完全反映其內在的編撰理論關係。綜合看來，體例祇能顯露部分乃至很少一部分內在編撰理論關係特徵，大量的內在編撰理論關係特徵必須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如教科書編撰的教學理論依據、原則、方法、材料選擇等等，其“差異”和“同一”關係都須要明確。相信通過這些方面的比較，內在的編撰理論關係會逐漸清晰。

三、對部分日本學者編撰漢語教科書旨在進行文化侵略的目的性認識不足。

在日本明治時代，的確有一些學者是出於經濟、文化、學術等方面的考慮而編撰漢語教科書，他們為中日各個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中日友好的使者，我們不但應予以充分肯定，而且要永遠緬懷他們的歷史功績。但是，相當一部分日本學者編撰漢語教科書旨在進行政治、軍事、文化侵略，我們對這些學者的目的更要加以深入認識。如《自邇集平仄編——四聲聯珠》(1886)，福島安正編輯，英紹古校訂。六角恒廣指出，該書中充斥着政治、兵制、人情、風俗、習慣、地理、氣候等內容，隱含着當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需要的各類情報。顯然，該書就是為日後侵略中國而作準備的。當時日本的特命全權公使、海軍中將榎本武揚在《敘》中強調“此書以聲繫言，以言繫語，風土人情，以至軍國重事，網羅搜討殆無餘”。由此可知，福島安正編寫該書，傳授漢語祇是幌子，刺探中國各個方面的機密纔是真正目的，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二十年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挑起的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場戰爭決不是偶然的，其軍事準備工作完全可以從明治時代算起，漢語教科書的編撰可以認定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日本學者編撰漢語教科書的歷史反面作用不能等閑視之。

四、没有能够從教科書體現的編寫“類別”特點出發認識其價值。

每一本漢語(包括漢語方言)教科書都有自己的個性特徵,如果没有深入挖掘,就談不上科學地總結其編寫特點;没有總結編寫特點,就不能加以橫向與縱向的比較,當然也就難以認識其學術價值所在。我們研究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會話教科書時就感到,日本漢語會話教科書的編撰過程,實際上就是研究漢語(包括漢語方言)日常會話模式並使之付諸教學實踐的過程。他們並沒有宣稱自己已經建立了漢語會話分析系統,但却已經能够很好地運用漢語會話分析理論研究漢語會話材料,這本身就值得關注。通過大量的漢語會話教科書,我們已經感受到了漢語會話語言教學研究的豐富性,更為當時成熟的漢語會話分析理論的魅力所吸引,這顯露的是他們漢語會話分析理論的應用效應。現代學者的會話分析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在“話語分析”基礎上逐漸形成的一門科學;日本漢語會話教科書與現代會話分析理論的許多暗合正說明其思考的相通性,值得特別注意。漢語(包括漢語方言)會話教科書文獻如此,其他如與漢語學習相關的辭典,文法、語音訓練、文選等教科書也是如此。這一方面的深入探索應當能够帶給現代學者多方面的的理論思考。

五、很少從語言學習者的角度觀察教科書的實用性特點以及教學效果。

日本學者編寫漢語教科書,最基本的目的還是幫助日本人學習漢語,並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理論與實踐模式。六角恒廣已經觀察到了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的一些實用性特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教學效果。如《日本中國語教學書志》第七章提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出現了軍用官話教科書興盛的局面,出版了《兵要支那語》《軍用商業會話》等書,很富於時代特點。不過細究起來,

這些書大多是速成會話教科書,可以看作是由戰爭的狂熱所催生的漢語教科書畸形發展的實證。透過六角恒廣等學者的研究,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討,日本學者在編寫漢語教科書時,着眼於學習者、強調實用性的特點究竟有哪些表現。六角恒廣從時效性角度,認為“速成、急就、捷徑”是一個特點;他還以學習者的身份,結合職業歸屬領域,區分軍用、商用等,體現職業學習的特點。他編印了《中國語教本類集成》,分門別類,也有這方面的考慮。至於教學效果,雖然缺乏當時的學習記錄,但可以肯定,教科書本身應該有所反映。

我們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實用性特點以及教學效果的認識,應該比六角恒廣等學者更有條件深入。原因在於,他們已經為我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比如分類理論意識以及資料匯編等等。我們完全有條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編寫的內在、外在機制,編寫的需求機制以及速成教育的功過得失,速成非正規化的優勢與劣勢,日本明治時代漢語速成教科書的現代意義等問題作出更為周到細密的分析。

六、對漢字文化圈視野內日本學者編寫教科書的語言特點挖掘不深。

從大的範疇來看,日本明治時代學者編寫漢語教科書屬於漢字文化圈內的漢語教科書系列。現在一些學者宣導的“國別化”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研究,就是基於不同國家的不同主體民族情況而進行的漢語教學研究,但“國別化”祇是考慮到了不同國家的不同主體民族情況,却没有考慮到同一個國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情況,以及不同國家不同主體民族的“同一性”問題。“漢字文化圈”漢語教學探討則屬於不同國家不同主體民族“同一性”的研究,有時候意義更為重大。這是因為,漢字文化圈漢語教學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特定的歷史文化區域教學,在漢字的旗幟下,漢語教學

“同一性”顯得尤為突出，在承認“同一性”前提下進行“差異”的研究，會有更大的收穫。無論是理論建樹還是教科書編寫實際情況的具體總結，都是漢字文化圈內單個國家主體民族漢語教學研究所難以企及的。目前漢字文化圈視野內日本學者編寫教科書的特點挖掘基本上還屬於未起步階段，相關的研究尚有待於大規模開墾。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有學者涉足這個領域。

七、日本漢語教科書本土化的語言研究歷史綫索須要進一步摸清。

日本學者善於模仿，漢語教科書編寫也不例外。日本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教科書編寫是從模仿英國人威妥瑪《語言自邇集》(1867)開始的，這一點日本學者已經有明確說明，比如從《亞細亞言語集》《清語階梯語言自邇集》到《官話指南》就是如此。但我們對日本漢語教科書模仿《語言自邇集》的具體綫索還不是很清楚。六角恒廣等學者零散地討論過這一問題，但並未展開系統論述。我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進一步探討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模仿《語言自邇集》的具體脈絡。對歐美學者和中國學者在日本人編寫漢語教科書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我們不但要從體例編寫上觀察，而且還要從具體內容以及語言意識、教學理念等方面進行研究，這樣纔能有效地得出結論。

我們關心的是，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編寫由模仿走向了獨自創造的道路？例如，有學者認為《日清字音鑒》是日本《韻鏡》式漢語教科書的創造的產物，與《語言自邇集》迥然有別。為什麼日本學者會在跟風《語言自邇集》之後又回歸到傳統的《韻鏡》式教科書的編寫？是不是東亞漢語研究的歷史傳統，尤其是中國漢語研究和教學的科學意識得到了再一次的確認和回歸？遺憾的是，還沒有學者對這一類問題予以明確回答。日本明治後期漢語教科書呈現的多元化語言教學模式表明，日本漢

語教科書的編寫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體系非常完備,在世界範圍內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的本土化及其獨創性特點是揭示其多元化語言教學形態構成的根本之所在,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都是必須關注的。

八、日本學者對口語與書面語關係的認識還須要甄別。

漢語書面語與口語的差距在清代是非常明顯的。漢語書面語基本是“看的漢語”,而口語基本是“說的漢語”。清代漢語書面語基本上是以先秦雅言為基礎的文言文,清代官方口語主要是北京官話,還有許多他們認定的漢語方言口語。日本明治時代學者對口語與書面語關係的認識是與其編寫漢語教科書的意識緊密相關的。明治初期,日本學者沿襲舊有的“唐話”觀念,認定清代官方口語主要是南京官話,所以編寫教科書或進行教學主要以南京官話為標準。後來,他們發現清代官方口語與南京官話有別,實際交流中主要以北京官話為基準,而且有名的《語言自邇集》也是以北京官話為基準的。所以,編者迅速調整編寫策略,向北京官話靠近。從模仿英國人威妥瑪《語言自邇集》開始的北京官話教科書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北京官話的面貌,這一點也是比較清楚的。但重視口語教學並不等於完全忽視書面語系統的教學,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編寫了一些與清代漢語書面語使用相關的教科書。如《清國時文輯要》(1902),足立忠八郎編,就選擇了啓牘、照會、告示、奏摺、上諭、國書、尺牘、論說等清代通行的漢語書面語實用文體資料作為教學內容。比較而言,這方面的教科書既要考慮到學生“看的漢語”的接受能力,又要考慮到“寫的漢語”的寫作能力,難度更大。所以,在編選時就不能不考慮降低學生的接受度,在一定程度上向“口語”靠近。另一方面,口語教學雖然以北京官話為基準,但書面語因素也難以避免,如上流社會語言中的許多詞語就是書面語常

用的,再加上一些外來語,如日本漢字詞語進入口語等情況的存在,可以想見純粹的口語化也是不現實的。教科書編寫者如何把握兩者關係的度,涉及到許多理論性的問題,值得關注。把握日本明治時代學者對漢語口語與書面語關係的認識,無疑有助於清代漢語演進歷史以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史的研究,但因為牽涉的材料以及理論問題比較複雜,研究的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漢語方言教科書文獻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比如所謂臺灣語教科書編寫就與實際的閩南語存在着一定距離。

九、對商業、軍事等特定領域漢語教科書編寫的重視,帶給今人的啟發尚待理清。

區分軍用、商用,本身就是以職業應用為編寫標準,目的性非常強,突出了漢語職業學習的特點。與一般的漢語學習不同,特定領域的漢語學習,尋求的是特殊的規律。我們研究這方面的教科書,應該考慮從以下幾方面着手:其一,在何種理念支配下重視特定領域漢語學習?實用就是需要,日本明治維新帶來了實業強國的理念,軍國主義思想貫穿國家行為的各個方面,漢語學習當然也不例外。其二,無論是速成的需求也好,還是強化專門領域漢語學習的功利性也好,集中考慮的都是講求效率的原則。就當時來看,突破了一般漢語教學理念的束縛,形成了獨特的教學思想。其三,凝結成特定領域漢語教科書編寫模式,帶給今天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其四,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軍用漢語教科書編寫呈現出明顯的政治化傾向,應該說與明治時代漢語軍用教科書模式的承襲有着密切的關係。

出於上述考慮,區分軍用、商用、政用、農用等類別,全面而系統地研究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當有助於我們轉換思維方式,靈活看待漢語學習的許多問題,別有一番天地。

十、散見於日本、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